

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 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



肖莉丹 著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atterns of
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s Evolution



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 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

肖莉丹 著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atterns of
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s Evolution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肖莉丹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 - 7 - 5668 - 1656 - 6

I. ①组… II. ①肖… III. ①女权运动—研究—中国 IV. ①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3105 号

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
ZUZHI DONGYUAN JINGYING DONGYUAN YU ZHONGGUO
NUQUAN YUNDONG DE YANJIN LUOJI YANJIU
著 者：肖莉丹

出版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潘雅琴
责任编辑：潘江曼
责任校对：范小娜
责任印制：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91 千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脉络	1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女权运动的萌发	3
一、女权崛起中的男性启蒙及其革命逻辑	4
二、知识女性的觉醒	11
三、女子参政：女权的初次实践	18
第二节 五四新思想影响下的女权运动	23
一、女权运动的资源准备	24
二、女权运动的高涨	35
三、女性的自我矛盾与困境	43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44
一、从革命动员到生产动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发生逻辑	45
二、女性形象的国家塑造及其话语体系	52
三、妇女真的解放了	58
第二章 转型期中国女权运动的组织动员	63
第一节 国家动员	65
一、国家转型与女权运动	66
二、女权运动中的国家行为	82
第二节 政党动员	88
一、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运动的目的	89
二、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运动的方式	95
三、对政党动员妇女运动的评价	109
第三节 妇联组织动员	110
一、妇联的组织特征与行动逻辑	111
二、妇联推动妇女运动的实证分析	115
三、妇联与国家的冲突	126

第四节 民间妇女组织动员	130
一、民间妇女组织的类别与运行现状	131
二、民间妇女组织的行动	134
三、民间妇女组织行动的资源动员	140
第五节 国际社会组织动员	145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影响	145
二、国际社会组织的行动——以联合国行动为例	151
 第三章 转型期中国女权运动的精英动员	159
第一节 女性知识精英与女权运动	161
一、性别视角、女权思想与女权行动的先导	162
二、高校女教授与女权运动的理性推进	171
第二节 女性文化经济精英与女权运动	179
一、打造女性节目，倾听女性声音	182
二、积极参与政治，竭力为女性发声	183
三、举办公益活动，促进职场女性发展	184
第三节 冲突与分歧	187
一、社会精英与妇联的分歧	187
二、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博弈	189
三、女性精英与妇女大众的矛盾	192
 第四章 中国女性的社会抗争	195
第一节 拒绝性别暴力	198
一、抗争的行动轨迹	198
二、抗争剧目及其动员机制	205
第二节 公共场所的骚扰与抗争	211
一、骚扰事件的缘起及其引发的论战	212
二、女权主义者的抗争行动	215
三、抗争的机制分析	218
四、对骚扰事件的进一步思考	221
第三节 女性社会抗争的意义	223
一、塑造女性自身话语体系	223
二、积聚社会力量	224

三、促使女权运动发展	224
第五章 女权运动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229
第一节 中国女权运动的三个面向	231
一、作为常规政治的妇女运动	232
二、作为具有社会运动形态的女权运动	233
三、作为社会抗争的女权行动	236
第二节 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模式	238
一、中国女权运动的四种模式	238
二、国家与性别的亲疏离合关系	242
第三节 女权运动与中国的民主政治	244
一、社会运动对国家民主政治的影响	244
二、女权运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	247
结语：中国女权运动的未来展望	251
参考文献	252

第一章

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脉络

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①，从兴起时就有自己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妇女从个性压抑到个性解放，从无权到开始争权，从囿于家庭到走向社会，都经历了一段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其复杂性在于，要改变传统的性别关系，结束中国历史上妇女的屈从地位，并非仅仅依靠女性的力量或者女性的行动就能实现，它是与中国所处的宏观背景及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的。女性与男性在冲突与合作中逐渐进行着关于两性角色和价值观的重构和阐释。其艰难性在于，一方面，女性权利的获得是伴随着女性在革命、战争中的流血、牺牲，在生产劳动中做出的“贡献”而间接获得的，并且这只是部分权利。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男性始终占领着“霸主”的地位，这注定了妇女要为实现男女平等的伟大理想，付出更大的勇气与代价。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女性精英与妇女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女性精英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及妇女组织的短效机制又制约了以男女平等为目的的女权运动的发展。国家、政党强大的意识形态与动员结构对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权运动有重大的影响。

当代中国女权运动有其发展的路径和过程，我们需要考察女权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认知与剖析今天所发生的女权运动的性质与特点。基于这一目的，本章将以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女权运动为蓝本，考察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演进过程——辛亥革命时期女权运动的萌发，到“五四”运动后争夺权利的女权运动的高涨，再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重点探讨影响女权运动发生发展的机制与因素，展现各个行为体（男性精英、女性精英、妇女组织、国家、政党、妇女大众）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与关系。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女权运动的萌发

在100年前的中国社会，女性是以裹着小脚、闭守深闺、受男性支配的形象存在着。1900年前后，“女权”一词出现。它被视为“民权”与

^① 孙兰英：《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第96~100页。

“人权”的衍生之物。中国女权的兴起与女性的觉醒都离不开男性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积极传扬，它大致经历了从先进男性的“唤”，到先进女性的“觉”，再到妇女大众的“醒”的过程。

一、女权崛起中的男性启蒙及其革命逻辑

（一）男性启蒙者的出现

中国的女权运动在初兴之时，主要是由男性倡导和宣传的。虽然不乏一些女子在开明家庭或环境风气的影响下逐渐觉醒，但更多关注女子问题的还是男性。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开始思考如何改良女性的问题。康有为同情妇女的悲惨遭遇，痛斥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①。康有为痛心疾首地抨击缠足这一残害女性的行为，认为它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国粹”，而是一种自杀愚蠢的行为，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②。康有为于1883年就在家乡发起过不缠足会，只是当时的影响不大。他在《大同书》中为妇女设想了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他说道：

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犯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攘其权哉，女子亦何得听男子独擅其权而不任其天职！^③

康有为根据天赋人权的思想，主张女性要接受教育，参加国政，在法律上获得个人独立身份。他还认为固定的夫妻关系应该解体，完全平等的男女只根据爱情签订有期限的契约，进行共同生活。^④然而，在当时，这

^①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页。

^② 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页。

^④ [日]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些都只是美好的或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难以付诸实践。

梁启超对女性的关注则集中在不缠足和女子教育上。梁启超在早期关于女性的著作里^①主张以富强国家为最终目标，试图改良女性的智力与体力，这就要求女性废缠足以健壮身体，受教育以提高资质。梁启超批判给女儿施加“刑罚”的父母是“愚人”，因此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愚昧行为。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谈到女子教育的四大功能：一是变“分利”为“生利”，二是除无才之累，三是兴母教，四是益胎教^②。梁启超认为，女子由于“不能自养”而完全依赖男子，是“分利”之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必须接受教育，寻找工作，成为“生利”之人。而且，受教育的女子一旦成为母亲，对婴儿的胎教以及小孩的早教甚有益处，可以培养出更加优良的后代为国家效力。在1897年，梁启超就与郑观应、康广仁、经元善等人酝酿开设女子学堂，经过多次上书南、北洋大臣，申诉创办女子学堂的理由，终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于1898年成立了。然而，梁启超提倡兴办女学，其目的在于培养贤妻良母，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③。

对于“女权”的普及，贡献最大的是马君武和金天翮^④。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女性论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马君武的贡献在于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和密尔的《论自由》，同时还介绍了密尔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摇旗呐喊。当中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说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马君武在《女权说》中申明了女性也应该参与政治的主张^⑤。与梁启超富强国家女性论目标不同的是，马君武的目标是让男女获得同等的权利。

马君武的《女权篇》与《女权说》流传较广，拥有较多的读者。此外，与马君武著作有同样影响力的是金天翮的《女界钟》，题目意思是要敲响唤起女性的觉醒之“钟”。金天翮在《女界钟》里抨击禁锢妇女的传

^① 这些著作主要包括《戒缠足会叙》《记江西康女士》《变法通议·论女学》《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倡设女学堂启》和《禁早婚议》等。

^② 参阅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③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④ [日]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⑤ 参阅[日]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统伦理道德，提出妇女应该挣脱封建束缚，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提倡婚姻自由，倡导女子教育，力主女子参政^①，他提出了女性应争取的六种权利：入学权、交友权、营业权、掌握财产权、出入自由权和婚姻自由权。在女子教育方面，金天翮反对将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主张将其培养成与男子无差别的革命新人，这从他提出了女子教育的八个项目可看出：

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功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②

这些男性一方面同情、关怀处于弱势的妇女，另一方面又寄望于通过妇女的力量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相关的言论获得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女权”的提出让男人与女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意识到女性的价值与作用，这间接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制度，重新塑造着两性的关系。

（二）男性为何唤醒女性

毋庸置疑，男性启蒙者的女性说在客观上刺激并鼓励了妇女意识的觉醒，但是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先进男性在唤醒女性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图，这些意图反映了男性特有的思维逻辑，揭示了男性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观念。这使得妇女的觉醒是具有较强目的性的、不彻底的。

男性之所以要唤醒女性主要是基于三个逻辑思路。

第一，女弱则国弱，女强则国强。女性强弱与国家强弱成正比，或女性文明度与国家文明度成正比，是大多数男性启蒙者的逻辑观点。在他们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妇女是国家贫弱的原因，同时，妇女也成了民族

^① 张素玲：《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② 金天翮：《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和国家振兴的希望^①。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女性受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束缚与残害，导致中国一半人口的智力与体力的羸弱，使国家衰弱。清末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在《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中说道：

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
今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遑论女权！
虽欲国之不亡，乌得而不亡？所谓“亡国之源”也。^②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看来，女子身体瘦弱，无学无识，更无法生养强壮、聪明的后代。康有为说道：

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匡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流此弱种，犹可忧危贫。^③

梁启超认为妇女的无学是国贫民弱的根源，“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无学始”。为此，他才极力要求废缠足、兴女学，重视母教与胎教。梁启超更是将母教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④

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保教”为忧天下之忧之人的三件大事^⑤。要“保国”，则必须“保种”；要“保种”，则必须通过教育。女性作为占

^① 张素玲：《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② 蒋维乔：《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1904年第3期，第74页。

^③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转引自张玉法、李又宁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⑤ [日]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人口总数一半之人，同时又作为男性一半的“导源”，因此，可以说“妇学为保种之权舆”。^①

第二，与西方国家对比产生的危机。我们在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等著作里不难发现，他们口中的中国弱女子的对照物不是中国男性，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他们每每在文章中拿中国女子与西方女子作比较，拿中国与西方强国进行对比，是因为处于在国家衰弱时内心产生的危机感与自卑感。他们希望寻找出救国强国的良方，进而赶超发达国家。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就表达出对美国、日本等强盛国家的羡慕：

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②

对比之下，梁启超倡导中国须模范文明之国，努力进行女子教育，从而获得与美国、日本匹配国力的可能性^③。这里也体现了梁启超的危机意识，如果不振兴中国女子教育，则会沦落成印度、波斯和土耳其一样衰弱的国家。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是男人/男权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④。例如，金天翮的眼光是注视着西方男性的^⑤，他在《女界钟》的开篇就描述了以下一段话：

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柳杖，肩随细君，挈带锥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③ [日]须藤瑞代著，姚毅译：《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④ 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⑤ 参阅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①

金天翮表面是羡慕欧洲男子的潇洒，实质是自叹中国男人矮人一截，不能昂首阔步而引起的焦虑和挫败，因此预想通过解放女子而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在当时进化论的框架中，男性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赶超^②。男性将人权、民权与女权相结合后，女性便可享受同男性一样的权利，接受一样的教育，同男性一起加快建设国家的速度，从而超越西方列强，进而实现国民“昂首阔步”的快乐。

第三，借女性问题谈男性问题，将男性看作女权的捍卫者。

男性精英提倡的妇女应拥有的入学权、交友权、婚姻自由权、财产权等属于社会权利而非政治权利，索权的对象是封建社会和礼教制度^③，这不但是女性要争取的权利，同样也是男性想争取的权利。在面对日渐崛起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时，男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危机感，他们意识到自己要做出改变。要想成为自由、现代、文明的国家的国民，男人不但要改变自身，同样也要改变女人。男性认为，在西方列强面前，自己是奴隶，而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要摆脱奴隶的地位，女权首先应崛起，女权与人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男人并不排斥女权的扩张，女权崛起则国家随之兴盛，男人也就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这里又隐含了另外一条逻辑，即男性精英把自己想象成女权的捍卫者。反过来，他们通过对女权的言说来捍卫自己的主体地位。

（三）男性如何唤醒女性

男性精英在促成女权崛起上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个是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妇女饱受“缠足之害、装饰之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常年被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遵循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本没有“权利”意识。在女性的思维中，“权”是属于男性的事物，女子只是男人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男性精英通过文字、言论和行动改变女性固有的观念。首先，男性精英会在其关于女性问题的著作中表达对女性所遭受的悲惨遭遇

^① 金天翮：《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③ 参阅张素玲：《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页。

的同情，缠足、婚姻恋爱不自由、行动受约束、无法接受文化教育等封建社会的“罪状”被一一列出。这些文字在思想上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引起了青年女性的广泛共鸣。其次，男性精英肯定了女性的重要作用，金天翮等将女性塑造成“国民之母”的形象，希望按照此目标培育女性，这会激起女性心中的自豪感，把“生育”这件原本是束缚女性身体和行动的事情看成是为民族、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荣之事。再次，通过对“天赋人权”的宣扬告诉女性，女性与男性同为“人”，理应享有同样的“人权”，他们在一国之中同是“民”，也应享有同样的“民权”，尽同样的“义务”，因此女性也要上学堂，搞生产，参与革命。最后，男性精英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女性废缠足，争取婚姻自由，为女性办女子学堂和女子报刊，让女子发出自己的声音。

促使女权崛起的第二个策略是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男性精英提倡女性要想获得自身的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则必须与男性共同担负起同样的国民责任，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洪流之中^①。金天翮认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是“吾男子与吾女子共和之义务也”。陈天华在《警世钟》里也写道：“中国人四万万，妇女居了一半，亡国之惨祸，女子和男子一样，一齐都要受的。那救国的责任，也应和男子一样，一定要担任的。”^②又说：“现在是扩张女权的时候，女学堂也开了，不缠足会也立了，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妇女吐气。”^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从一开始就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女权的产生是民族主义的附属物。关于男性精英对女性的启蒙，我们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分析。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许多先进的女性在男性所创造的平台上成长起来，她们在男性的动员下产生了反抗意识，勇于挑战封建习俗，开始追求恋爱自由，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发表提倡自由的文字，并参与反清反帝的革命。从消极的一面来看，男性启蒙

^① 张素玲：《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② 陈天华：《警世钟》，转引自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③ 陈天华：《警世钟》，转引自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者虽然强调“天赋人权”，提倡“男女平等”，但这更多是义务平等，而非权利平等，他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摆脱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没有反思自身存在的大男子主义。他们的逻辑只是希望通过女权来振兴国家，从而使男性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更好的生活。这种对妇女的启蒙是片面的、不彻底的，也根本没有动摇男性霸权的社会制度。

二、知识女性的觉醒

不可否认，在男性精英的启蒙下，一批知识女青年开始觉醒，并在社会政治中崭露头角，她们对男性的女权论有积极的回应，同时，她们也在思考如何通过妇女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处境与地位，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冲突与矛盾中构建着自身的主体地位，使自己成为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女国民。

（一）先进女性登上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时期，少数知识女性就开始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1897年下半年，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妇女为了讨论创办女学堂的事宜，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谭嗣同的夫人李闺、康广仁的夫人黄瑾娱等为女学会的倡办董事。不久，女学会又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主题的报纸——《女学报》，倡导女性独立自强，摆脱对男人的依附。主笔全部由妇女担任，其中包括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等，她们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① 主编潘璇说道：“我道这报是救我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多引一线，多积一面。”^②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号召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率先挣脱家庭和传统的重重束缚，毅然走向社会，投身革命。其中，较为著名的女性有秋瑾、陈撷芬、何震、唐群英、林宗素等。她们或设女学，或结团体，或办报刊，身体力行地宣传和实践着男女平权，热切地表达了谋求女权的愿望和决心。

秋瑾和陈撷芬可被视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秋瑾和陈撷芬强

^① 参阅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② 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